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瑞士] 葛恭 (Olaf Gigon) ● 著

柏拉图与政治现实

Platon und die politische Wirklichkeit

黄瑞成 江澜等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遂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 Aldus 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的体例。

可是，到了18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 自上世纪20年代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以及 Erich Loewenthal 在上世纪40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 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人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90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译本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 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 译）
- 3 克力同（罗晓颖 译）
- 4 斐多（刘小枫 译）

卷二

- 1 克拉底鲁（刘振 译）
- 2 泰阿泰德（观溟 译）
- 3 智术师（观溟 译）
- 4 治邦者（张爽 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 译）
- 2 斐勒布（李致远 译）
- 3 会饮（刘小枫 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 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 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 译）
- 3 希普帕库斯（乔戈 译）
- 4 情敌（吴明波 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刘振 译）
- 2 卡尔米德（彭磊 译）
- 3 拉克斯（黄旭东 译）
- 4 吕西斯（黄群 译）

卷六

- 1 欧蒂德漠（刘麒麟 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 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 译）
- 4 美诺（郭振华 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王江涛 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王江涛 译）
- 3 伊翁（王双洪 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魏朝勇 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纆 译）
- 2 王制（史毅仁 译）
- 3 蒂迈欧（叶然 译）
- 4 克里提阿（叶然 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 译）
- 2 法义（林志猛 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 译）
- 4 书简（彭磊 译）

杂篇（刘锋 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编者说明

瑞士古典语文学家葛恭(Olof Gigon)是巴塞尔人,他从事的学业与他出生于此的城市的品质相一致:在19世纪,巴塞尔已经是西方的古典学重镇。葛恭的父亲是巴塞尔大学医学院教授,葛恭长大后就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系,博士论文以赫拉克利特为题(*Untersuchungen zu Heraklit*, Leipzig 1935),教授资格论文以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为题,专攻文本考据。获得教授资格后,葛恭起初在瑞士弗里堡(Fribourg)大学任古典语文学系教授,不久后出任伯尔尼大学古典语文学系主任(其间当过一任伯尔尼大学校长),二战后还兼任德国慕尼黑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晚年退休后移居雅典,直到去世。

葛恭教授早年在古典学界声名鹊起靠的是以下三部力作:《古希腊哲学的起源:从赫西俄德到帕默尼德》(*Der Ursprung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Von Hesiod bis Parmenides*, Basel 1945);《诗和纪事中的苏格拉底形象》(*Sokrates: Sein Bild in Dichtung und Ge-*

schichte, Basel 1947);《古代哲学》(*Antike Philosophie*, Bern 1948)。与多数古典学者埋头考据、笺释不同,葛恭非常关注现代哲学问题,力图打通古典学与现代哲学,把现代哲学问题的古希腊源头呈现给现代哲学界。《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Grundprobleme der antiken Philosophie*, Bern 1959)实际上是从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来看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柏拉图概念词典》(*Begrifflexikon zu Platon*, Zürich/München 1975)的编撰方式是,从现代哲学的流行观念出发来索引柏拉图作品中的相关表达——显然,葛恭致力于疏通现代与古代,他主持编写的三部文集更为充分地反映了这一学术取向:《古希腊医学思想的开端:从荷马到希珀克拉底》(*Der Beginn des medizinischen Denkens bei den Griechen von Homer bis Hippokrates*, Zürich/Stuttgart 1967),《古希腊—罗马宗教、法律、文学和语言短论集》(*Kleine Schriften zu Religion, Recht, Literatur und. Sprache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München 1968),《古代法哲学与社会哲学》(*Antike Rechts- u. Sozialphilosophie*, Frankfurt a. M./Bern 1988)。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从今天来看,葛恭打通现代哲学与古代思想的努力,热情可嘉,成效却并不理想,甚至让人觉得吃力不讨好。葛恭曾用 5 百多页篇幅来解读柏拉图《王制》前四卷(*Gegenwärtigkeit und Utopia: eine Interpretation von Platons Staat*, Zürich 1976),可见他的古典学功夫非同一般,可惜,这种从现代哲学视域出发的古典解读必然半途而废——正如我们熟悉的一些现代儒家学者,从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或民主政治关怀出发去重新解说古代儒家,难免以失败告终。

葛恭的传世佳作并非他旨在打通现代哲学与古代思想的古典研究,而是他留下的大量古代经典的译注和笺释。在这方面,葛恭堪称成就斐然,最著名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若干要籍

的德译和笺释,好些译品已经成为大学文科基本读本: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论天象》、《论灵魂》(Zürich 1950, ²1983),《尼各马可伦理学》(Zürich 1951, ²1967),《论诗术》(Stuttgart 1967),尤其《政治学》(Zürich 1955, ⁹2003);西塞罗的《图斯库伦论辩集》(München 1951, ⁶1992),《善恶的极限》(München 1988),《论诸神》(Darmstadt 1996)。葛恭辑录、德译、笺释的《伊壁鸠鲁集》(*Epikur, Von der Überwindung der Furcht. Katechismus, Lehrbriefe, Spruchsammlung, Fragmente*, Zürich 1949, ⁴1991)亦为善本;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前两卷注疏(Basel 1953/1956)也是难得的佳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倘若习得扎实的古典学功夫,与其吃力不讨好地去消除古代与现代的隔阂,不如踏踏实实做古典文本校释:通过古典文本笺释,让今人在现代—后现代语境中得以重新阅读古典文本,才是切实的贡献。

葛恭涉及的古典文本面相当广泛,可以说涵括了整个古典传统,包括古典基督教(《古代文化与基督教》[*Die antike Kultur und das Christentum*, Darmstadt 1967]和《一个古典语文学家的新约斟议》[*Erwägungen eines Altphilologen zum Neuen Testament*, Basel 1972])。葛恭一生为学非常勤奋,在古典学专业学刊上发表过大量有价值的古典学论文。与我国诸多笃学的文史学家一样,葛恭的古典研究的精品往往见于专题文章,而非专著。这些文章敢于立异而又精湛绵密,精细到家却又不失大体,绝无大而化之的泛论。这里选译的四篇讨论柏拉图作品的文章就是证明:我们可以看到,葛恭研读经典触觉之精细、文献视野之广博,的确令人大开眼界。

这里辑录的四篇文章选自葛恭自己结集的文集《古代哲学研究》(*Studien zur antiken Philosophie*, Berlin 1972),这部文集辑录了葛恭 32 年间的古典研究论文:从 1936 年的《论阿那克萨哥

拉》到1968年的《前苏格拉底派导引》，论题范围从古希腊自然哲人直到罗马哲学。由于文集篇幅较大(400多页)，而且大量援引古希腊语、拉丁语原文，译者难觅，我们仅选取了其中关于柏拉图的四篇，结为一书。

从这四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葛恭非常关注和细究柏拉图作品的文学性，从而我们可以了解到，关注柏拉图作品的文学性其实是西方古典学界研究柏拉图的传统路数之一，并非施特劳斯的发明——问题仅在于，即便关注柏拉图作品的文学性，仍然还有一个视野问题。葛恭的这四篇柏拉图研究也向我们表明，欧洲的古典研究要摆脱维拉莫威兹-耶格尔的历史主义古典学窠臼，颇为艰难，尽管葛恭已经难能可贵地摆脱了当时在德语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对古典学的不良影响，也没有沾染后来在古典学界泛滥成灾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习气。

古典语文学出身的学者，写起文章来大多非常讲究文字。据说，葛恭的文字特色是，把德语的艰深与古希腊语的古奥结合得很好。对我们来说，这便意味着读起来让人感觉极为繁难，遑论翻译难度——除了两位译者和校者的辛劳，黄瑞成博士付出了特别的努力，他校定了《游叙弗伦》一文，还覆校其余两篇，谨致谢忱！

刘小枫

2009年5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目 录

编者说明(刘小枫) /1

柏拉图与政治现实(黄瑞成 译) /1

《游叙弗伦》的场景(谭娜 译 黄瑞成 校) /21

《普罗塔戈拉》的形式和内容(江澜 译 丁悟 校) /77

《法义》的开场(江澜 译 卢白羽 校) /155

柏拉图与政治现实

黄瑞成 译

哲人不会像官方纪事家那样研究政治的现实性(Realität)。对哲人而言,现实(Wirklichkeit)是另外一码事:在希腊哲学的早期阶段,现实只是过眼云烟(Meteora),事后才成为*αἰδία*[恒在]。但若两者都关注现实和真理,则有理由提出哲人如何关注政治领域的现实(Wirklichkeit)这个问题。诗人的情形完全不同,诗人虚构现实,在诗人的作品中,各种形式的现实仅以某种程度的不真实方式变得可见。

有理由向哲人提问不假,但绝非理所当然,首当其冲的是苏格拉底派(Sokratik)圈子,我们在这个圈子中碰到了柏拉图。

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对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他的学生们可不想索性当作一桩令人悲伤的不幸搁置一旁。相反,苏格拉底之死有其意义和必然性。这种意义和必然性由此可以见得:有智慧的人没有理由为苏格拉底之死感到恐惧。这种意义和必然性亦可由此见得:哲学和城邦的现实是两种力量,两者本质上是相异和敌对的。所以,苏格拉底之死必定使苏格拉底的门徒深信:如果哲人不想因政治而毁掉,

就应远离政治。

下文将对此作出分析。倘若我们有可能从总体上把关于苏格拉底派学说的纷繁复杂的证据统一起来,就有可能将“呵护每个人的灵魂”确定为其共同的基础。在背离传统的贵族价值、财富价值、荣誉价值和权力价值方面,阿里斯提波(Aristippos)、安提斯蒂尼(Antisthenes)、爱斯基尼斯(Aischines)当然还有斐多(Phaidon),与柏拉图《申辩》(*Apologie*)中的苏格拉底完全契合。然而,这意味着退出城邦生活。政治就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合力。统治者通过政治追求荣誉,被统治者则通过政治获得实利。但阿里斯提波在色诺芬(Xenophon)的《回忆苏格拉底》(*Mem.* II, 1)中宣告,他既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所以,他不过明确表达了与老苏格拉底哲学非常接近的立场。对此,柏拉图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或更为明确地持有这种看法:柏拉图通过第三条道路(eine dritte Komponente)使πολιτεύεσθαι[参与城邦统治]完全失效,在苏格拉底的门徒中,这第三条道路是柏拉图所特有的,这就是βίος θεωρητικός[静观生活],静观生活的任务是断然抛开历史性的可变之物,完全专注于研究宇宙和不变的存在。这种生活方式不适合任何实践和政治活动,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和德谟克里特(Demokrit)的言论已然承认了这一点,这些言论远早于柏拉图对话。关于柏拉图只需查考两段文字就足够了,尽管它们非常著名,但仍未得到充分解释(无论哪个段落,都有必要最小翼翼地字斟句酌):《高尔吉亚》(*Gorgias*) 484c—488b 和《泰阿泰德》(*Theätet*) 172b—177c。这两段话与《王制》(*Politeia*)并非没有关系(本文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局部追踪此关系)。

然而,《王制》恰恰转回了政治领域。因为πολιτεύεσθαι[参与城邦统治]是哲人的义务,无疑是一种最为吊诡的义务。我们不可忘记,柏拉图明确无误地把需要哲人王(《王制》473c 及其以下)

称为他的苏格拉底言论的三个悖论中最大的悖论。比妇女和儿童共有(Gemeinschaft)更为吊诡的是:头脑清楚地面对永恒的哲人却起而统治城邦,治邦者则应当研究哲学(philosophieren)。

因此,在献身于政治现实之时,柏拉图彻底违背了研究哲学的本义。因为,事实上并不容易搞清楚:为了关注卑贱者而不计后果地放弃与高贵者交往,究竟会有多么正确和必要。

以此为基础,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柏拉图是如何关注政治现实的?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研究。这里只选取无疑尤显重要的两个事实。

首先需要问,柏拉图打算凭自己的思想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产生多么广泛的影响。其次,简单探讨柏拉图的城邦建构本身在多大程度上能对每一种政治现实的恒定状况作出估计。

首先需要说明,我们的思考必须局限于《王制》:这样做首先有其外在根据。如果这些外在根据站不住脚,我愿将“柏拉图书信”和《默涅克赛诺斯》(*Mene.xenos*)排除在外。这些文本究竟表明了什麼,我认为仍非常不清楚。有重要而又无法驳倒的理由使我们很难相信,《默涅克赛诺斯》闻所未闻的笨拙的框形对话(Rahmengespräch),《书简七》哲学上的混乱和历史方面的冗长(尽管表述极好),是柏拉图本人的手笔。我自然不会不明白下述反诘的分量:如果《默涅克赛诺斯》还有《书简七》不是柏拉图本人的手笔,又是谁的?但我宁可尽量别把这些文献牵扯进来。

柏拉图对其时代产生政治影响的意愿究竟怎样?

《王制》以正义的本质问题为开端。很快就推进到关于正义的价值的第二个问题和正义对于灵魂的功能的第三个问题。我们由灵魂越出而推及城邦,借助作为灵魂的巨大对应物(368c—369a)的城邦,正义的功效更容易看得明白。到第四卷末尾,城邦首先被建立起来,却没有考虑出现了是否可行的问题。所描述的正义城

邦(隐含着:正义的人)在现实中或许根本不存在,这种思想在此,尚未出现。第五至第七卷发生了变化,正义问题变成了三个悖论。这三个悖论总是与不断重现的保证有关:这根本关系到可能的事物而非仅仅是εὐχή[祈望](450cd, 452e等)。457d—e的转变尤为典型。我们面临着妇女与儿童的共有这一悖论,鉴于此悖论,我们十分迫切地提出了δυνατόν[可行]和ὠφέλιμον[有用]问题。格劳孔(Glaukon)极力坚持讨论这两点。可苏格拉底请求谅解。他打算设想出这样一个共有组织,紧接着再来讨论可行性问题。466d讨论了第一个方面。在此,苏格拉底仍局限于粗略提示,其他ζῷα[动物]中也存在这种κοινωνία[伙伴关系](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口中的这个论据的奇特性,在此不予追究)。446e—471c话题重新岔开,所以471c—e格劳孔一定要苏格拉底保持秩序。所勾画的政制(Politeia)的可行性问题不可忽略。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缓兵之计和格劳孔的责难,以灵巧的舞台方式促使读者注意,这是一个困难而又无法避免的问题。

答案是双重的。苏格拉底说,我们不可能指望真正实现完全正义的人和完全正义的城邦。如果能尽力接近完全正义之现实性(正如《泰阿泰德》中与神相像和《斐多》中“尽可能”消解肉体),想必已经足够了。完美只是人们追求的范型。在此总的保留态度中还包含着第二个问题:如何才能约莫实现这种完美;尽管这里引入了一个教与学的原则,这一原则无疑是在古老的技艺中形成的:所追求的城邦的恰当状况得以建立的最基本的转变是什么(473b)? 答案是哲人必须成为王,王必须成为哲人。苏格拉底(473c)强调指出,尽管这绝非轻而易举,但总是可能的。499b—d这段话重新评论道:声称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两种情况都不可能成为现实,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若非如此,就有理由嘲笑我们是乡愿之徒。”501e—502c重复了这一点,第七章末尾

又最后一次回复到这一点,在这些地方苏格拉底通过回顾完美城邦的构造和卫士与王(Regenten)的培养之道解释说:

那么,如果满足了上述条件,现在你们承认我们并非在谈论幻想之物,而是在谈论尽管困难却有其可能的事情吗?
(540d)

因此,在哲人王的身份(Philosophenkönigtum)中,柏拉图看到了实现其完美城邦的可能的历史道路。但这条道路可真够难的。根据完美城邦的蓝图,随后关于μεταβολή πολιτειῶν[政制转变]的各卷,差不多足以支持实现完美城邦的信念。因为,从最好的城邦堕落为克里特—拉哥尼亚(Kretisch-lakonisch)式的金权制(Timokratie),进而堕落为寡头制和民主制,是由久远的无历史性(Geschichtslosigkeit)发展到已知的历史领域。这种堕落由以开始的那个错误(Fehler)与由无历史性进入历史的过程一样是无法把握的。所以,像西塞罗(Cicero)那样的人(或许并不是第一人)发现柏拉图的完美城邦不过是杜撰而已,与此杜撰相对的乃是罗马早期 optimus status rei publicae[政制的最佳状况]。

但并非人人都这样解读《王制》。看一眼柏拉图学园(Academie),我们就会明白,在其创始人的时代及稍后一段时间,这个哲人团体表现出政治上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所知的漫步学派(Peripatos)和廊下派(Stoa)之所为。只要看上去有可能性,学园就必须将反对柏拉图意义上的僭主制当成自己的使命,将这种政制视为反哲学的κατ'ἐξοχήν[凭靠统治]的城邦政制形式,同时推进哲人王权(Philosophenkönigtum)。

但这里谈论的哲人王权,并不完全是柏拉图新创造的观念。它显然出自极为古老的表述:王者与智者休戚与共。王者身边

的智者是劝告者、催促者和警告者。在此,我们不涉及某个人,只指向《书简二》(311ab)所列举的内容,尽管在书信中这些内容显得很幼稚,但本身作为姓名材料却并非没有意味。人们把柏拉图与叙拉古(Syrakus)王侯的关系放在此背景中,自有其理。

然而,很难直截了当对柏拉图的西西里(Sicilien)之旅作出判断。流传下来的材料,整体上并没有为柏拉图本人及其伙伴本人的意图提供非常清晰的图像。此外,我们不应忘记,柏拉图只是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造访过叙拉古的哲人群体中的一个哲人。确定无疑的是,差不多与柏拉图同时,苏格拉底派的爱斯基尼斯(Aischines)和阿里斯提波在叙拉古逗留过。蒂迈欧(Timaios)(《希腊史家残篇》[*F Gr Hist*], 566 F 158)报告说,柏拉图的学生色诺克拉底(Xenokrates)曾造访过迪奥尼修斯(Dionysios),很可能是有一次作为老师的陪同去的。普鲁塔克(Plutarch)在《迪昂》(Dion 22)中说,柏拉图第三次去西西里时由外甥斯彪西波(Speusippos)陪同。这条记录应该出自一份报告的前言,在前353年后不久,提摩尼德斯(Timonides von Leukas)向斯彪西波报告了迪昂的远征和覆亡,看来普鲁塔克读过这份报告(《希腊史家残篇》, 561)。最后,据《纪事杂录》(*Ael. v. h.* 7, 17)记载,柏拉图的朋友欧多库斯(Eudoxos)在叙拉古拜访过年青的迪奥尼修斯。所有这些人为叙拉古带来了什么?很难更进一步说清楚。困难还在于,首先,迪奥尼修斯二世的肖像在传统中过于久远,很难统一。据确切报道,直到最后,即直到其罪有应得流亡到科林斯(Korinth),他都是柏拉图忠实的朋友;但另据报道,他是一个沉溺于声色犬马的人。

还有其他内容需要指出。或许值得对散见的讨论柏拉图学园πολιτεύεσθαι[参与城邦统治]的记录作专题研究。不必单看伊壁鸠鲁(Epikur),其实在部分古希腊述闻(Doxographie)中,